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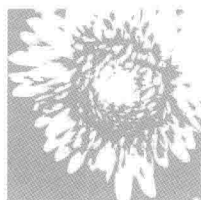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导师丛书

中国电影中青少年 形象的文化谱系研究

王 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导师丛书

中国电影中青少年 形象的文化谱系研究

王 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青少年形象的文化谱系研究 / 王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导师丛书)

ISBN 978-7-5203-3709-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电影影片-青年-人物形象-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J90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8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刁佳慧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审思青少年及其文化的方式	(1)
第一章 思想启蒙与中国青少年族群的诞生	(18)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人的主体性	(19)
第二节 启蒙：群体与个体	(23)
第三节 思想启蒙与青少年的文化赋权	(31)
第四节 青少年：东方与西方	(37)
第五节 作为个体主体的青少年	(43)
第二章 电影与青少年	(51)
第一节 青春触“电”	(54)
第二节 青少年的越轨与电影的疑惑	(65)
第三节 青少年的违逆与电影的含混	(77)
第四节 苟活的青春与电影的调侃戏谑	(89)
第三章 早期中国电影中的青少年	(94)
第一节 新派人物与早期中国电影	(95)
第二节 早期中国银幕上的年轻人	(100)
第三节 早期中国电影中青少年的文化谱系	(120)
第四章 “新青年”与“革命青年”的诞生与成长	(163)
第一节 “新青年”诞生的历史语境	(165)
第二节 对新英雄主义影剧的期待	(168)
第三节 银幕背后的年轻人	(173)
第四节 孙瑜电影中的“新青年”和“革命青年”	(182)
第五节 作为动机的异质性场景和异态化青春	(224)

第六节 五四传统与通俗剧质疑	(237)
第五章 个体意识觉醒的青少年	(248)
第一节 个性张扬的红衣少女	(252)
第二节 城市游荡的“凶猛动物”	(260)
第三节 边缘沉默的底层草根	(273)
第四节 追寻平庸的娱乐先锋	(283)
结语 追问启蒙	(295)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15)

义上看,这些症候恰恰是协调、合作和融合的前兆。在当下全球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语境中,不管在当今世界何种地域,也不管特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千差万别,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似乎日益表现出与社会主流价值渐行渐远的疏离和对抗。像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性传播一样,青少年问题似乎也已经在以同样的甚至更快的速度向更广更深的地域和空间传播。稍稍留意下青少年电影在全球范围的蔓延态势,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端倪。一时间,仿佛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斥和游荡着背离常规、特立独行、嗜血斗狠的青少年。在经历了短暂的神圣化阶段之后,青少年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撒旦与恶魔。妖魔化成为当今时代书写青少年及其文化的重要倾向。人们究竟如何想象、刻写和表征青少年?青少年与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如何?这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大问题。世界各国电影中无所不在的或顺从或违逆的青少年形象,既折射了当代社会的历史情境,又预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状况。

在现代性的追寻和实现过程中,青少年被越来越深地裹挟进社会转型的整体进程中。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青少年问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都是与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追求相伴随的。青少年问题投射了现代性文明的某些本质方面。随着现代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要求,现代性追寻早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文化潮流。然而,现代性的理论设计是一回事,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在现代性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想象之后,原来各个不同的国家、社会、民族、阶层和文化似乎都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伴随全球现代化而来的,是青少年问题的全球化。可以说,青少年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性文明的结构性问题。问题青少年四处出没,对全球治理和社会管理构成巨大挑战。很大程度上,青少年成为社会不安定和社会失序的重要诱因。历史地看,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青少年问题,并非青少年群体自身的问题;相反,青少年不过是社会危机的征兆和投射。违逆抵抗的青少年不过是症状,真正的病因却隐藏在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和文化逻辑中。

与全球青少年问题的危机状况相应,世界范围的青少年研究也面临诸多危机与挑战。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青少年研究理论范式的危机。在人类逐渐步入比特速度的文化语境中,社会变迁及其引起的青少年状况的动态变化,已把青少年研究的理论范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前些年,在中国,人们常常用“70后”“80后”之类的概念,标识和区分青少年族群。

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90后”“00后”世代快速成长,原先用来标识青少年族群的概念已然过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过去笼统用出生年代作为世代标识的命名方式,越来越与同一世代的青少年族群自身分化状况相冲突,而这正是廉思的《蚁族》系列和《工蜂》^①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根本原因。那些原本隐匿在社会边缘的代际、阶层阶级甚至性别族群,被聚焦、定格、放大,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能见度。当代中国社会深刻转型所造成的青少年族群的内部分化,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话语和学术建制往往以西方为范本,西方流行的各种理论和研究范式常常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自身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当然,转译、借鉴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然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本身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比如,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少年亚文化理论近年来就先后被引进、译介到国内。以《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为例,其在英国初版于1976年,2015年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②姑且不论书名副标题“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这一限制,单是这前后长达40年的时间差、两国遥远的空间距离、迥然有别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和各自所处的具体情境,就知道亚文化理论范式适用于中国的潜在危险。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确实具有各方面的比较优势。与《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被译介到国内的滞后状况相反,《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2004年在英国初版,2012年就有了中文翻译本。^③

确实,相对而言的比较优势,可以让我们把西方国家发明、运用和推动了几十年的学术成果,在短时间内全盘引进,以至于陶东风、胡疆锋等人主编的《亚文化读本》《粉丝文化读本》等几乎囊括了西方世界最早和

① 参见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蚁族Ⅱ:谁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参见[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参见[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最新的研究成果。^①然而,在译介和接受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直面西方社会现实的具有强烈问题针对性的理论与阐释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在挪移、借鉴这些理论时,我们如何处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如何用这些理论有效地观照当下中国现实?面对花样翻新的西方理论和概念术语,我们是在密不透风的理论丛林中,迷失自己,还是站稳自己的文化立场、坚持自己的价值逻辑,选择性地撷取其中真正有益的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或许,就青少年研究而言,理论借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理论自信和价值立场,及建基其上的理论创造和阐释模式。将各种花样翻新的西方理论硬套在中国问题上,无异于削足适履。实践证明,任何西方理论外来模式都必须经历必要的本土化、在地化,从而烙上鲜明的中国印记和中国特色。

与其深陷西方理论话语的丛林中,被蜂拥而来的理论范式和阐释模式所包围,对铺天盖地而又往往语焉不详的概念术语焦头烂额,还不如另辟蹊径,探寻适合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情境的阐释模式和理论方法。为了避免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误区,本书力避当初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设定,大胆抛弃原先设想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范式和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视野,转而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考察中国电影青少年形象的文化谱系及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梳理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脉络,剖析造成当代中国青少年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提出在当代中国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不仅伯明翰学派所依托的文化研究中心(简称 CCCS)不复存在,而且作为应对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情境的亚文化理论范式,也已经无力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亚文化范式的文化适应性和理论解释力大大降低和削弱。因此,在着手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中,本书倾向于以“青少年”置换“青年”,以彰显“青年”这一概念应该具有的延展性和持续性;以“文化”替代“亚文化”,借以突出青少年文化越来越强的建构性和包容性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纷纷质疑青少年研究的亚文化范式。正如

^① 参见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某些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产生并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亚文化研究范式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亚文化范式无法对女孩参与亚文化群体作出合理解释;(2)亚文化范式存在明显的将阶级观念本质化的趋势,倾向于将各种文化模式等同为工人阶级的抵抗观念;(3)亚文化范式对媒体在亚文化和文化身份建构方面的创造性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4)亚文化范式最大的缺陷是将“青年”界定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和年龄范畴,没有认识到青年完全可以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范畴、某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并最终变成后续文化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财产^①;(5)如果亚文化是针对主流文化而言的,那么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的分野,这就大大降低了亚文化概念的针对性和理论价值。

面对各方质疑和批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自己也不得不,在《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30年后再版时,撰写长达30页的“新版序言”——《再谈〈通过仪式抵抗〉》,来廓清和重申亚文化研究在当代的价值。在这篇“新版序言”中,霍尔回应了此书出版以来所遭受的各种质疑与批判,阐释了亚文化研究范式在今天可能具有的价值。最后,霍尔几乎不无狡猾地将亚文化界定为一种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它是一种重视和强调症候式阅读的方法论。霍尔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而不是简单描述、赞美或贬低)青年人现在是如何看待他们正在创造的事物的话,我们似乎依然需要像30年前那样,应努力在一些青年群体的日常行为和表现、更广泛的文化结构形态(cultural configurations)以及正在变化的历史局势等因素当中,去打通并探查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②

亚文化范式最终被霍尔简约为一种方法论,这确实是国内亚文化范式的追随者们始料未及的。如果亚文化范式的本质仅仅在于症候式阅读这一

① 关于青少年研究的发展脉络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作过详尽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估。参见[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端,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五花八门的学术生产呢?确实,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没有万古不变的学术真理。即便30年后霍尔深思熟虑而又小心谨慎地捍卫,亚文化范式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不济与无力。就当下中国青少年所处的历史境遇而言,亚文化范式无疑有其不可克服的问题。总之,亚文化理论范式始终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低度社会化群体的文化范式。

因此,在后亚文化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中,青少年研究必须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流动性、变易性与日益碎片化的文化语境相适应。当然,强调流动、变易并不是完全无视亚文化范式对变化的重视和强调,甚至连霍尔自己也承认,亚文化应该研究其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但实际上,在具体研究的实施上,这种变动性研究却很少真正体现出来。由此,在国外青少年文化研究界,亚文化范式所强调的挪用、嘲弄和抵抗,渐渐为融合、混杂和创造所取代,原本在边缘冷眼旁观的青少年群体,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性策略,渗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内在结构中。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和全球化的推延扩展,青少年文化既显示出某些差异性,也越来越表现出某些共同性。将社会和文化的动态变化内置于青少年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不仅是鲍曼等这样细心考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重大关注,也是让-查尔斯·拉葛雷(Jean-Charles Lagrée)等人强烈的理论呼吁。

拉葛雷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就是直面全球化时代青少年研究范式危机问题的论文集。在书中,来自亚美欧各国的青少年研究者分别对各国的青少年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科学的阐释和学理的分析。虽然研究者针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作为主编者,拉葛雷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赋予这些研究一种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拉葛雷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青少年研究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挑战?正是敏锐地感到全球化时代青少年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危机,拉葛雷既忧心忡忡,又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青少年问题。由此,他干脆将该书副标题确定为“现代性及其挑战”。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拉葛雷毫不讳言地指出,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青少年研究的“问题可能是:当处于社会体制极度变化的背景下,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继续使用过时的工具、参考文

献、方法和理论，对当今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①。由此，拉葛雷强烈呼吁，全球的青少年研究者应当把社会变化纳入青少年研究的分析框架当中。^②历史地看，青少年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处身性经验，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阐释模式，运用了某些行之有效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但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实，传统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必然遭遇新的困境和挑战。只需简单提及近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与青少年有关的社会性事件，特别是近年来蔓延全球的极端恐怖主义，就可以知晓传统青少年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的效力。

因此，在考察了世界各国青少年研究的现状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后，拉葛雷大胆质疑了传统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在拉葛雷看来，青少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应该成为解决青少年研究理论范式问题的逻辑起点；全球化和现代性应该成为阐释青少年问题的处身性框架和认识论基础。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卷入到全球秩序中，各国在全球化秩序中的位置和状态势必影响到自身的青少年状况。因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新的社会模式正在形成。^③这些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模式，要求青少年研究必须找到全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方能有效地反映出青少年问题的真实面貌，科学地阐释青少年问题，为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和合理解决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④当然，历史情境的动态变化，界定了青少年成长必须和将要面临的新环境、新现实、新的约束体系、风险以及机遇。^⑤对青少年而言，社会转型和社会变化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先在性，将青少年卷入各种社会风险与文化焦虑中。只有直面变化了的和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从全球化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和政治经济

① [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346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拉葛雷认为引发世界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全球化（globalization）、知识和信息社会（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社会化机构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ulatory and socializing institutions）和社会化机构及其框架的功能弱化（the weakening of the socializing institutions and frameworks）。参见[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⑤ 同上书，第7页。

环境出发,才能看清青少年问题的文化实质,青少年问题才能得到合理阐释和适当解决。

此外,早在1971年,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ocks)就将变化、变动的观点置于其研究中,考察了青年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其论述仍未完全摆脱青年在社会变迁中的被动、反叛、违逆和抵抗特征,但是变迁本身已成为一种考察问题的角度。^①随后,众多西方学者自觉地将社会变迁置于自身的理论视野中,安迪·福龙(Andy Furlong)、弗雷德·卡特摩尔(Fred Cartmel)等人在《青年与社会变迁》(*Young People and Social Change: New Perspectives*)中,将青少年置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语境中,考察青少年与社会变化及其持续性、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变动、群体依存模式、休闲生活方式等的互动关系,最终他指向了晚期现代性的认识论谬误。^②陈新银等人则将社会变迁植入青少年同侪群体关系的考察中。^③在所有这些观照和研究青少年与社会变动关系的研究者中,最为杰出的应该是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2007年,萨维奇出版了《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在该书中,萨维奇不仅是一个青少年文化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经历者。萨维奇从自身经验出发,鞭辟入里地考察了青少年族群的诞生,全面周详地探究了青少年文化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萨维奇甚至把青少年及其文化视为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青少年及其文化是社会运动内在的组成部分,着力探究了青少年努力在社会中发声的各种尝试。^④可见,将社会变动置于青少年及其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并非某种不切实际的学术广告,而是脚踏实地的学术行动。

与国内青少年研究界的普遍焦虑和深沉忧思相反,拉葛雷等人却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亚洲乃至中国青少年研究界寄予厚望。拉葛雷在指出全球化

① 参见[美]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陆建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See Andy Furlong and Fred Cartmel, *Young People and Social Change: New Perspectives*,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See Xinyin Chen, Doran C. French and Barry H. Schneider (eds.), *Peer Relationship in Cultural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参见[英]乔恩·萨维奇《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时代世界青少年研究可能存在的范式危机时，积极探讨了新的社会模式下青少年研究的可能途径。在拉葛雷看来，现代性和全球化不仅是观照青少年问题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同样也是阐释、研究和解决青少年问题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模型。拉葛雷特别指出第三部分是专门为中国读者所安排的。他认为：“与社会理论或一般社会学相似，亚洲的青少年社会学在两种不同但不对立的传统中发展。因此，亚洲的青少年社会学必须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要两种传统中寻求借鉴，又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进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社会学分支。”^①当然，拉葛雷是站在青少年社会学的角度期待亚洲和中国的。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强调青少年研究的学科性和独立性，从本质上讲，青少年研究依然是一种多面相的社会文化学研究。

在挪用移植、交叉比较与变异转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基本创新方式的情况下，或许，我们不应该担心青少年研究被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所湮没和遮蔽，我们应该忧虑的是闭门造车式的臆想和无所适从的现象描述。近代以来，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中，选择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民族强盛的想象将中国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现代性文明本身的问题叠加、扭结在一起，使历来重视家庭和宗族价值的社会微观结构彻底粉碎，传统的族群共同体逐渐式微，个体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面临和适应社会的变动。中国传统价值与现代性文明的内在紧张，对刚刚诞生的青少年族群构成重大威胁。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中，从传统家族伦理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青少年群体，在获得其文化命名的同时，也被建构成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存在。在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现代中国青少年从家族的“独”走向国族的“群”。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再次将脆弱敏感的青少年置于历史和现实的旋涡之中。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焦躁与不安不适，首先在青少年群体身上得到反映和投射。遭遇价值失落的青少年群体，似乎只有以决绝的动物式凶猛和草根式的坚韧沉默，对抗和抵御迎面而来的各种压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青少年族群的意识觉醒和主体建构，经历了相互关联但又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第一次觉醒通过梁启超、陈独秀等

^① [法]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人完成，它宣告了青少年族群的诞生，完成了对青少年族群的文化赋权，将中国青少年建构成以国族富强为己任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主体，群体主体性成为青少年群体和民族国家诞生的历史语境；第二次觉醒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漫长的群体身份建构和极端年代的过度和偏执之后，中国青少年恍然间领悟了独立和自由的真义，个体主体性成为这次觉醒的重要文化诉求。^①如果说，中国青少年的第一次觉醒是由上而下展开的，那么，很明显，第二次觉醒则是由下而上实现的。第一次是外在现实的直接要求，第二次却源于社会压力的内化。

由此，只有将当代中国面临的青少年问题置于现代性文明的整体框架中，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青少年问题的历史、现状及未来，青少年问题也才能得到合理阐释和全面观照。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审视青少年，将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内置在研究的结构肌理中，自然会摒弃青少年研究的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倾向；既看到青少年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裹挟的被动的一面，又充分意识到现代科技给青少年文化带来的崭新机遇。换句话说，任何关于青少年的研究都必须把社会、时代、历史传统与青少年的有效互动考虑进去。虽然当代社会的青少年状况并非青少年本身的问题，但置身于变动转型中的青少年并非全然被动的违逆与抵抗。相反，他们总是倾向于调用现代化和全球化赋予他们的各种便利和情境逻辑，积极应对，力图将自身的文化观念、生命体验内置在社会整体的文化结构中。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tadt)在《反思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 cultural 特征……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imaginaire)的成形与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图景、一种独特的文化方案的成形与发展。”^②由此，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不仅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而且带来了独特的制度前提。它带来了人的能动性(agency)、自主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观念的某些急剧转变。它带来了未来观念”^③。然而，现代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承

① 1980年长达半年的“潘晓讨论”代表了迷惘失落青少年的主体性要求。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探讨了青年人成长面临的苦恼与困惑，追问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讨论后来被誉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② [以] 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诺并没有在现实层面上得到充分体现，追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紧张。正因如此，现代性境遇中的青少年不得不以个体的方式解决现代文明的体制性问题。而各国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就成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对各国自身生存问题的回应。

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国内的学术研究往往转译、挪用西方理论方法和阐释模式。就青少年研究而言，源自英、美、德、法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往往将实用主义目的内蕴于青少年研究中。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在国内大行其道，其中，亚文化理论范式总是将青少年群体想象得凄惨和被动，除了仪式性地挪用、戏谑、拒斥和抵抗，青少年似乎无路可走。然而，随着文化的后喻性特征越来越明显，青少年群体对整体社会文化的贡献度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电子文明基本上是青少年的创造和发明。今天，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并非仅仅活跃于各种各样消费性、娱乐性和抵抗性的文化场景中，更重要的是他们使用、掌握，甚至发明了各种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文化方式和文化形态。无疑，这赋予当代社会的青少年越来越强的文化能力。

以电影为例，长期以来，世界电影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是青少年创造的。当然，全球电影工业近些年的变化与调整，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来自电影票房及其边际消费的统计数据雄辩地表明了青少年对于电影工业无以复加的重要性。近来，最为明显的趋势是，青少年并非单纯的文化哺育对象。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廉价、便捷、轻便的各种制作设备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人群参与到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这不仅引发了电影制作群体人口结构的急剧调整和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能力急剧增强。或许，随着一代代青少年的成长，文化的这种后喻性会愈来愈明显，而青少年参与文化制作、文化创造的年龄层次势必越来越低，对未来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口结构的调整与改变意味着电影文化经验结构和体验类型的转变。正因如此，本书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出发，关注中国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通过中国电影青少年形象的发展演变这个“管”，窥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这只“豹”，揭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青少年问题的实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方案的弊端，提出在中国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的理论构想。

当然，青少年研究范式的调整与改变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反叛—拒斥—抵抗，到较量—谈判—协商，并最终妥协—融合—

接受的过程。一度流行英美的青少年亚文化理论范式,往往偏执地认为反叛和拒绝是一种风格,是一种仪式化的象征性反抗。然而,在当代社会的后革命语境中,亚文化的社会氛围和价值逻辑已然被后亚文化的情境逻辑所置换。今天,无论是青少年群体还是青少年文化,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思考性和建构性特征。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深信:“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具备创新精神的。语言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而后来者历来富有惰性,是一种主要的保守力量。”^①

然而,在全球化的后革命语境中,青少年文化首先瞄准的,就是语言这个最稳定的社会制度。各种网络热词不仅渗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逐渐改变了语言的结构方式。我们只需要关注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不断进入主流词典的迅猛状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建构性力量的强大和深入。^②看来,后亚文化时代的青少年文化要改变和摧毁的并非某个具体的制度、体制和价值,而是通过隐秘、曲折和渐进的方式,将自己植入主流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最终浸染、改装甚至改变主流文化的面貌。由此,青少年文化并非简单粗暴地戏谑、违逆和解构;相反,它积极参与、卷入、融合并建构新的文化,最终将自己自然化为社会常识。青少年文化通过传统常识的去常识化和新奇异见的常识化这一交互过程,将自身体验内置于社会整体的文化结构中,并以此作为积极参与文化建构的具体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常识化和去常识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也非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连贯的漫长过程。随着一代代青少年的成长,自然化了的、透明的甚至转化为无意识的常识,再次成为解构和颠覆的对象,新的去常识化和常识化过程再次开启。如此一来,青少年文化就内置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文化密码,并最终固化、沉淀为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现代性毕竟是一套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准则。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全球传播已然引发一系列问题: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紧张,现代性的适应性问题,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全球化传播与个体化接受问题,等等。对中国而言,去封闭、全球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

① 转引自[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② 近年来,每到年底,世界各国媒体都以各种方式评选年度网络热词。很多热词后来逐渐被编入主流的字典、词典。“土豪”“吐槽”“拍砖”“接地气”“网购”和“点赞”等纷纷进入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表述。国内流行的某些网络热词,甚至进入了英文世界的权威辞典。

的必经程序。这些问题与这些程序扭结在一起，促使人们思考：作为一套社会方案和社会建制，现代性确实带来了物质的文明；但作为一套价值准则，现代性又将个体置于某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作为一种社会运作模式，现代性全球传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理应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当下的情况是，只要现代化仍然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与此相关的青少年问题就不会消失。与其他社会问题不同，青少年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持续性。因此，只有将中国面临的青少年问题置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才能明白中国青少年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不能强求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别国经验，寻求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探求解决之道。而对那些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中国化的地方性问题，则应该追根溯源，在充分剖析和认识问题的基础上，科学阐释、合理引导、积极尝试，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或许这就是拉葛雷寄予中国或亚洲青少年研究的责任和使命。青少年问题作为现代性的显在后果，促使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国外青少年研究的相关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吸取相应的教训，使青少年研究具备一个前瞻性的理论维度。因此，当西方现代性文明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当西方没落成为不争的事实时，我们应该探讨现代化的新的可能性，为目前的现代性困境探寻一种替代性方案，努力将青少年问题化解为积极的社会动力，将其视为社会文化主动积极的建构性和构成性力量。

诚如拉葛雷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如果把年轻人看作是一个反映形势的‘敏感器’同时又是其操持者，可能更合乎现实……年轻人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是社会结构的行动者。从这方面看，如果不把‘青年人’这个群体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联系起来，那么怎么可能进行实证甚至是理论研究呢”^①？与现代性的发源地不同，中国发生的无论是现代性追寻还是全球化融入，都是与自身的历史传统、价值信仰和社会制度相连的。如果中国的青少年研究对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充耳不闻，而执着于“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某些方式，关注、理解和解决青少年问题就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清醒地认识中国在全球化处境中的具体位置，才能为中国的青少年研究准确定位，中国的青少年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观照和有效阐释。如何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化处境与其地方性的社

① [法]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4—345 页。